

数字经济赋能构建新发展格局的 内在逻辑与实现路径

陈福中^{1,2},袁欣悦²

- (1.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国家对外开放研究院,北京 100029;
2.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北京 100029)

摘要:作为新科技革命中诞生的新经济形态,数字经济深刻重塑了原有的经济活动形式,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建设提供了新的思路。为了全面准确了解数字经济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能够发挥的积极作用,在阐述数字经济与新发展格局基本概念和科学内涵的基础上,深入分析数字经济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逻辑机理和实现路径。研究认为,当前经济循环活动中生产、流通、分配、消费4个环节均存在堵点,阻碍了新发展格局的构建,而数字经济发展在通过推动产业升级、激发内需潜力、聚合区域市场、助力创新驱动进而畅通国内大循环的同时,通过推动中国参与国际分工机制转变、创新国际贸易模式促进了国际大循环的畅通;数字经济的发展也增强了国内国际两个市场联动效应,有助于形成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良好局面。研究表明,为充分发挥数字经济对构建新发展格局的积极作用,需要进一步夯实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培育数据要素市场,建立自主创新体制,推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在国际市场中加快数字产业“走出去”的步伐,积极参与数字经济全球治理,提升国际数字贸易竞争力。

关键词:数字经济;“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数字技术;经济高质量发展

中图分类号:F49;F12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1-6248(2024)01-0044-16

收稿日期:2023-11-27

基金项目: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3JJB02)

作者简介:陈福中(1983-),男,四川宜宾人,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经济学博士。

Inner logic and implementation path of building a new development pattern empowered by digital economy

CHEN Fuzhong^{1,2}, YUAN Xinyue²

(1. The Academy of China Open Economy Studies, University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nd Economics, Beijing 100029, China; 2.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Economics, University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nd Economics, Beijing 100029, China)

Abstract: As a new economic paradigm born in the new technological revolution, the digital economy has profoundly reshaped traditional economic activities and offered fresh insights into forging a new “dual circulation” development pattern. To comprehensively grasp the positive role the digital economy can play in constructing this new development pattern, this study delves into elucidating the fundamental concepts and scientific underpinnings of both the digital economy and the new development pattern. Furthermore, it conducts a thorough analysis of the logical mechanisms and implementation pathways through which the digital economy fosters the establishment of this new development pattern. The study identifies obstacles in the current economic cycle across production, distribution, circulation, and consumption, hindering the realization of the new development pattern. Conversely, the digital economy’s advancement, while facilitating industrial upgrading, stimulating domestic demand potential, consolidating regional markets, and propelling innovation-driven domestic circulation, facilitates smoother international circulation by bolstering China’s engagement in transforming the global division of labor mechanism and innovating international trade modalities. Moreover, the digital economy amplifies the linkage effect between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markets, fostering a mutually reinforcing dynamic between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dual circulations. Research underscores the necessity of leveraging the positive impact of the digital economy in establishing the new development pattern. This entails further solidifying digital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fostering the development of the data factor market, establishing an independent innovation ecosystem, promoting deep integration between the digital economy and the real economy, expediting the global expansion of the digital industry, actively engaging in global digital economy governance, and enhancing the competitiveness of international digital trade.

Key words: digital economy; “dual circulation”; new development pattern; digital technology;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改革开放 40 多年以来,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国民经济水平不断提升,社会主要矛盾发生转变,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与此同时,国际社会也面临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逆全球化和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大国博弈加剧,新冠疫情对全球经济造成巨大冲击,进一步加速了世界格局的演变。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统筹发展和安全,作出了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战略决策,为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内的工作提供了明确指引。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夯实国家经济发展根基,增强国家经济实力和核心竞争力,是在更加不确定和不稳定的国际形势下把握发展主动权,继续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必然选择^[1]。

当前学界对“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理论基础、时代背景、科学内涵和基本特征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的探讨。裴长洪等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角度探寻新发展格局的理论渊源,指出构建新发展格局不仅是顺应中国经济发展客观规律的结果,更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世界经济动态平衡理论^[2]。沈坤荣等认为,改革开放以来积累的物质技术、市场规模、内需潜力和人力资本基础是中国经济中长期面临挑战和风险时主动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根本保证^[3]。董志勇等通过对中国经济发展格局演进历程进行梳理,进一步探讨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动因,明确了新发展格局的政策导向^[4]。黄群慧从经济现代化视角出发,强调新发展格局本质特征在于高水平

的自强自立,其战略内涵在于推进高质量工业化^[5]。在此基础上,一些学者从多个方面进一步讨论了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实践路径。洪银兴等基于马克思社会主义在生产和分工理论,从需求侧、供给侧和开放发展 3 个方面对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实现路径进行探讨^[6]。江小涓等从全球价值链创新链的发展趋势出发,指出要以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赋能经济增长,充分发挥外循环的赋能作用^[7]。彭红枫等聚焦新发展格局的金融服务,指出在国内市场要通过优化金融服务体系刺激经济发展,在国际市场推进跨境资本流动自由化及支付阶段自由化提升金融开放水平,推动国内国际双循环协同发展^[8]。

新一轮科技革命以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发展为基本特征,在其不断发展过程中催生出数字经济这一新经济形态,通过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重塑了传统经济运行的各个环节^[9]。数字经济发展得到学界密切关注,对数字经济的内涵、特征、发展趋势等方面进行了广泛探讨。在数字经济时代,数字化的知识和信息成为关键生产要素^[10-11],不断更新迭代的数字技术为生产效率提升和经济结构优化提供了新的强大动力^[12-13],冲击着原有的生产生活方式和治理方式,对全球利益分配格局造成深刻影响,推动了世界大变局的进一步发展变化^[14-15]。数字经济的健康发展有利于增强供需匹配,推动各类要素在市场中的流动和合理配置^[16],帮助市场主体构建更加合理的组织形式^[17],畅通生产环节,延伸产业链条,优化产业结构^[18],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和共同富裕^[19],进一步推进对外

开放,这与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逻辑相契合^[20-22]。

数字经济对新发展格局的积极作用也得到一些学者的关注。李震对数字经济赋能新发展格局理论基础和现实困境进行探讨,并针对性地提出了推动数据立法、强化基础研发、加快人才培养、扩大国际合作等政策建议^[23]。李天宇等在对“双循环”发展战略目标定位与核心内涵进行深入分析的基础上,从要素市场培育、关键技术突破、国内市场潜力挖掘等方面提出相关政策建议^[24]。胡莹等从马克思资本流通理论出发对数字经济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的理论机制进行探讨^[25]。王亚菲等采用综合评价方法构建指数并建立面板模型实证研究数字经济发展对经济双循环质量的影响作用^[26]。但总体而言,当前直接研究数字经济与构建新发展格局之间内在关系的文献相对较少,且多从细分领域出发,缺乏经济循环活动整体角度的深入分析。因此本文在梳理数字经济与新发展格局概念特征及科学内涵的基础上,深入分析数字经济在畅通国内经济循环活动、提升参与国际循环水平、加强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之间联系关系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并立足当前新发展格局构建现状,提出数字经济赋能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实践路径。

党的二十大以来,数字经济发展受到党中央的高度重视,并上升为国家战略。因此,进一步加深对数字经济和新发展格局科学内涵的认识和理解,深入挖掘数字经济发展与构建新发展格局之间的逻辑关系,有助于在新科技革命方兴未艾的当下,以数字经济发

展助推构建新发展格局,进一步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

一、数字经济与新发展格局的科学内涵与内在联系

(一)新发展格局的内涵

经济活动本质是一个基于价值增值的信息、资金和商品(或服务)在不同经济主体之间流动循环的过程^[27],经济活动各个环节的畅通是经济持续发展的基础。“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着眼于经济活动各环节之间紧密的连接关系,着力推进经济活动各环节循环的通畅以提升经济活动整体效率和质量。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包含两个方面的要求:一方面是强调国内循环的主体性地位,指出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在于自主创新、自立自强^[28];另一方面强调要在国内循环和国际循环之间建立有效连接,借助国际市场中的要素、需求和技术进一步畅通国内循环,建立更加完善且具有竞争力的国内经济体系,从而更好地参与到国际循环中。因此,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中,国内循环和国际循环在比重上不同,但连接紧密,缺一不可。

之所以强调国内循环的主体地位,一方面是因为进入新发展阶段,中国作为后发国家在经济赶超过程中的技术依附性和产业低端锁定已经成为经济高质量增长的重大阻碍,供需的不平衡和生产体系内部环节不畅的问题日益凸显,行业间、地区间发展不协调的现象仍然较为严重。另一方面,近年

来,逆全球化和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全球产业链呈现出区域化集聚的态势,全球生产分工内化明显,国际环境的不确定性加剧,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科技封锁愈加严重,因此出口导向型经济战略已经不符合新发展阶段国家经济增长的需要,自主创新、自立自强成为构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必然要求^[29]。

与此同时,中国已经具备了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基础条件。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建立了完整的工业产业体系,众多人口也为经济提供了超大规模的消费市场。丰富的资源禀赋和巨大的经济容量赋予了国内市场非常强大的生产和消费能力,能够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经济体系,具有巨大的增长潜力。因此,只有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着力打通国内经济各环节之间的梗塞,促进科技创新的独立自主,才能保证充分发挥超大规模国内市场优势和内需潜力,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

另外,经济发展过程中国际循环的重要作用不容忽视。以国内需求为落脚点,建立起国际国内双循环之间的有效连接,可以使国内市场充分利用国际市场需求、丰富的生产要素和先进技术,调节国内经济的供给和需求,确保经济活动的流畅性,保证与最先进的前沿科学技术的连接,提高经济整体的生产水平和创新能力,提升中国在国际价值链分工中的地位,增强在国际经济中的竞争力,使中国更好地融入世界市场,实现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完成由“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的转变。

必须看到,“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建设不是中国应对世界大变局的被动之举,而是国家在经济迈入新发展阶段的主动选择。新发展格局着眼的是经济中长期的发展,目的是实现长期可持续的经济增长,争取长远的国际竞争主动权,实现与全球经济深层次的交融^[4]。因此,在对外开放中要进一步承担大国责任,兼顾发展与安全,以中国经济的繁荣发展带动全球经济的复苏。

(二) 数字经济的概念和特征

数字经济是在新一轮科技革命中诞生的新经济形态。2016年杭州G20峰会《二十国集团数字经济发展与合作倡议》中阐述了数字经济的定义:“数字经济是指以使用数字化的知识和信息作为关键生产要素、以现代信息网络作为重要载体、以信息通信技术的有效使用作为效率提升和经济结构优化的重要推动力的一系列经济活动。”^①与传统经济相比,数字经济具有以下4个显著特征。

第一,数据成为关键生产要素。在数字经济时代,随着数字技术在经济活动和社会生活中的广泛应用,所有生产活动环节中产生的数据都能得以记录,数据产生主体、记录内容和内容体量空前丰富,从海量数据中提取出的信息通过解读分析得以成为创造性的知识,参与到经济主体的生产和消费决策中^[30],对传统的生产要素及其配置方式进行数字化改造,降低了交易成本,实现生

^① 《二十国集团数字经济发展与合作倡议》原文链接 http://www.g20chn.org/hywj/dncgwj/201609/t20160920_3474.html。

产效率和质量的增加,从而全面提升社会生产力。随着数字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和产业数字化的不断发展,未来一段时间数据必将保持迅猛增长的态势,成为经济活动的战略性资源。

第二,技术创新的速度和影响力明显提升。数据要素具有非竞争性、非完全排他性、外部性和即时性特征,相对于其他生产要素更易流通和扩散,因此信息和知识的传播效率得到巨大提升,降低了技术创新的信息获取成本和试错成本。技术创新速度和创新成果转化速度明显加快,新产品、新模式不断涌现并快速流入市场。此外,由于数字技术具有较强的通用性,创新技术的应用更加广泛,能够对多个产业、多个生产环节和社会生活等诸多方面产生颠覆性影响。

第三,数字经济具有极强的扩展性和融合性,引致实体经济多方面的变革。数字技术更新速度快、应用领域广泛的特征,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融合程度不断加深。传统企业通过数字化改造提升生产效率和组织运营效率,传统产业通过数字化改造延伸价值链,完善供应链体系,实现生产的社会化、协同化,不断延伸出新的生产组织形式。实体经济主体之间的关系日渐紧密,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边界日益模糊,规模经济、范围经济和网络经济效应能够更加充分发挥。

第四,数字经济阶段经济增长的驱动力明显改变。数字经济作为新一轮科技革命的主导型产业,在促进经济增长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微观层面,数字技术在企业生产过程中的应用极大地提升了生产的质量和效

率;中观层面,产业数字化促进了产业内部结构的高级化、合理化和绿色化发展;宏观层面,数字经济的产生与发展促进了整个经济活动中生产要素的流动和合理配置,不断改进生产方式,提升了社会生产力。而数字经济的发展以数据要素的生产和数字技术的创新为基础,传统依靠生产要素投入促进经济增长的效率相对大幅降低,因此技术创新逐渐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

(三)数字经济与新发展格局的内在联系

数字经济已经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经济增长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数字经济的健康发展有利于新发展格局的构建,而合理的经济布局也必将推动数字经济进一步发展。当前,中国数字经济发展在量和质上都实现了突破,在总体规模不断扩大(见图1)的同时,与实体经济的融合也走深向实。三次产业数字化转型不断推进,成为提升国民经济整体效率的重要支撑。

数字要素的低成本、可复制、非竞争性、排他性(部分排他性)特点和数字技术的通用性,决定了数字经济具有较强的扩散性和融合性,有利于降低交易成本,提升信息传播的速度和效率,促进产业间的融合发展,从而增强经济活动各环节之间的联系,进一步畅通经济循环。同时,数字经济具有明显的技术创新效应,知识和信息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进一步凸显,也符合新发展格局自主创新、自立自强的本质要求。因此,数字经济不仅是激发一国经济发展内生动力、助力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也是重组全球要素资源、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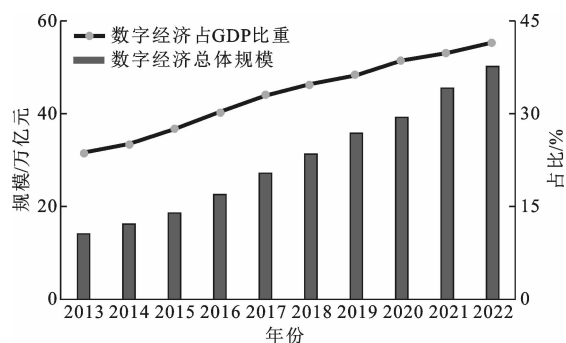


图1 2013—2022年中国数字经济总体规模及其GDP占比^①

塑全球分工结构、改变全球竞争和利益分配格局的关键力量。

二、构建新发展格局的现实困境

构建新发展格局是中国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对基本国情进行全面谨慎自我审视并总结历史经验之后作出的重要战略决策。但步入新发展阶段,中国经济发展不充分和不平衡的问题、新发展格局建设过程中的现实问题、经济循环中的堵点依然存在,可能会影响经济的长期稳定增长。

(一) 生产过程

改革开放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经济实行出口导向型战略,利用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廉价劳动力快速融入国际市场,从而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增长,迅速完成了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初步发展,形成了完整且规模庞大的工业供应体系。但步入工业化后期,生产体系发展不平衡和不充分的问题仍然存在。首先,产业发展面临低端锁定的困境,导致供需结构不匹配。中国在融入国际分工体

系的过程中,由于初级产业基础薄弱,创新能力差,一直处于价值链底端,形成一定程度上的要素和路径依赖,产业升级缓慢,低端产品相对过剩和高端产品生产不足同时存在,产品不能满足人们日益升级的消费需求,出现了生产与消费的失衡。其次,经济增长的动力转换不畅。随着人口红利逐渐消失,原材料价格上升,传统产业在国际竞争中的优势丧失,依靠生产要素高强度投入驱动经济增长的模式难以为继,但在生产过程中依然面临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问题,西方国家对我国技术封锁,产业链和供应链的安全性与稳定性受到威胁,因此亟需通过提升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能力,突破“卡脖子”技术问题,实现经济增长向高质量可持续的创新驱动模式转换。最后,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发展不平衡,金融业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不足,经济有脱实向虚趋势,必须对系统性金融风险加以防范。

(二) 流通过程

流通环节的畅通是保证资源、要素和商品合理有序流动的基础,对于生产效率的提高和价格信号的正常发挥具有重要意义,也是经济活动循环畅通的重要保障。当前流通经济中依然存在着各种问题。全球经济形势复杂多变,尤其是在新冠疫情冲击之下,逆全球化和贸易保护主义有抬头之势,国际贸易壁垒和技术封锁依然存在,影响了国际市场中生产要素和商品的流动。而国内市场体制机制仍不完善,政府与市场的边界仍有待厘

^① 数据来源于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CAICT) <http://www.caict.ac.cn/>。

清,要素市场存在着一定程度的扭曲,阻碍了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要素市场价格机制不能反映真实的供求状况,生产要素配置效率不高,要素活力难以充分发挥。同时,部分区域间发展水平的不平衡和具体制度安排的差异导致了区域性市场的分割。户籍制度、土地制度的不完善,导致城乡劳动力流动受阻。国内市场各地区和城乡之间的生产要素流动不够畅通,影响了区域协调发展和工业化、城镇化与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推进^[31]。另外,作为新出现的生产要素,中国数据要素市场在运行过程中仍存在问题。数据要素的流通缺乏统一的交易规则和合理的定价机制,政府对于平台垄断的监管和规制缺乏完善的制度体系,数据安全尚不能得到完全保障,数据资源的共享和数据价值挖掘都有待提升。

(三) 分配过程

分配在平衡生产和消费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合理的分配格局能够使劳动力实现充分的再生产,进而实现社会再生产的良性循环^[32]。但随着近年来居民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收入分配格局中存在的问题也不断暴露。一是初次分配和再分配过程中,居民收入份额虽然都呈现逐步上升的趋势,但整体不高,说明居民整体消费水平提升速度不够快,未能充分实现居民收入与经济的同步增长;而企业收入份额仍相对较高,生产过程中的高投资依然在持续,这可能加剧生产与国内需求间的不匹配。二是行业、地区和城乡间收入差距依然明显,中等收入群体规模相对较小,可能导致居民整体有效需求不足,消费总量较难扩大^[33]。三是经济“脱实向虚”

趋势明显,金融机构收入占比增长迅速,吸引了更多资金流入,将进一步挤压实体经济利润空间,阻碍实体经济转型升级,同时压缩居民财产性收入增长空间,不利于收入分配格局的优化调整。

(四) 消费过程

消费是生产的终点和再生产的起点。当前中国消费市场相对收缩(见图2),是经济循环不畅的重要原因。中国消费市场存在一些问题。一是国内消费率长期处于较低水平。由于强调储蓄和住房的传统思想、社会保障不完善与老龄化趋势日益严重等原因,中国居民平均消费倾向不高,消费总量明显较低。受到全球新冠疫情的影响,生产成本上升,消费成本提高,消费预期降低,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消费的复苏。二是市场供需匹配性不强,生产与消费环节畅通受阻。随着经济发展水平和居民收入水平的不断上升,居民消费能力和消费需求不断升级,对中高端商品的需求日益增加。但由于国内生产结构中低端商品仍占据主要地位,中高端产品生产受限,生产升级需要提升,国内生产不能满足国内消费需求,产生了消费外流的情况。三是分配过程中的收入差距和收入流动性减弱等问题导致收入消费弹性不足,收入分配格局对消费的提振有限,不利于国内需求的提升。四是市场机制不完善和商品市场分割导致超大市场规模的优势难以发挥,影响了整个消费市场体量的扩大,区域间发展不平衡的问题仍然存在。五是长期实行出口导向战略,经济对国际消费具有一定的依赖性,而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使出口面临阻力,

国际消费对于经济增长贡献的不确定性增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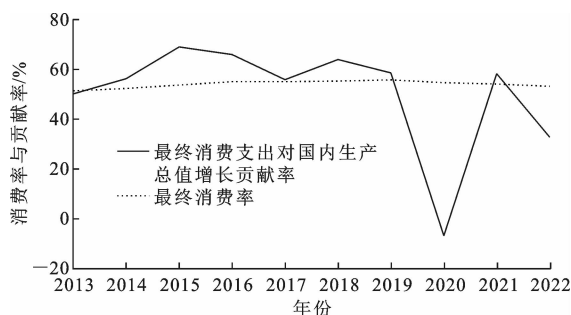


图2 2013—2022年中国消费率及消费贡献率^①

三、数字经济助推新发展格局构建的内在逻辑

数字经济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不仅在于通过信息、通讯和计算机等数字产业发展带来的经济总量提升,还在于通过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过程中发挥加速效应、创新效应和网络效应,对生产运行机制和市场组织形式进行全面改造,重塑消费者的消费方式和消费观念,推动社会治理方式的转型升级,从而影响整个经济循环的运行。因此,数字经济的发展在畅通国内大循环和国际大循环中都能够发挥重要作用。

(一) 数字经济与国内大循环

1. 数字经济推动产业升级

生产的结构性过剩是当前国内生产环节所面临的主要问题,其根本原因在于产业结构的高级化和合理化程度不足。数字经济作为更高级与更可持续的经济形态,能够从多个层面改造传统生产方式和产业结构,从而缓解生产环节内部发展不充分与不平衡的问题。

从宏观层面来看,一方面数字经济的发展

促进生产要素的合理有序流动,优化生产要素的配置方式,促进要素配置效率不断提升,推动产业结构持续升级。另一方面,数字经济推动更高附加值的二三产业进一步发展,产业不断由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转变,实现产业结构高级化。就中观层面而言,三次产业内部新业态和新模式的出现,生产技术的升级换代,使得要素配置方式更加高效,市场组织形式不断创新,产业链上下游生产协调程度大幅提高,价值挖掘更加充分,价值链地位得以攀升。具有更高劳动生产率的智慧农业、高端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加速发展,三次产业尤其是制造业和服务业之间的融合日渐深入,三次产业内部产业高级化程度不断提升。基于微观层面的视角,数字技术在生产和经营过程中整合了要素资源,提升了企业对市场信息的获取能力,行业内部竞争更加激烈,优胜劣汰的过程不断加速,促进了各行业内部的转型升级。

2. 数字经济激发内需潜力

供需结构的不匹配和居民消费疲软是国内生产—消费环节的关键堵点^[34]。数字经济的发展通过强化生产的消费导向性、创新消费模式和改变居民消费理念充分挖掘居民消费潜力,助推消费升级,从而连通生产—消费环节。

第一,数字经济通过强化生产的消费导向缓解供需结构性不匹配问题。数字技术对信息流通速度和范围的提升,使企业能够及

^① 数据来源于中国国家统计局官方网站,参见 <https://www.stats.gov.cn/>。

时捕捉消费需求的新动向,生产出更能满足消费者需求的产品。同时,消费者产品信息搜集能力也大大增强,对于产品质量和自身体验感的要求日益提升,以消费者体验为中心的新零售形式由此诞生。根据消费者需求生产的定制产品层出不穷,保证了居民个性化、特色化与多元化的消费需求得以满足,长尾效应得以充分发挥。

第二,平台经济的发展创新了消费者的消费形式,拓宽了消费的途径,为消费者提供了空前丰富的选择。电商平台不断完善营销模式、交易监督机制和消费反馈机制,使消费者权益得以保证,增强了消费者的消费意愿,也畅通了生产企业获取消费者需求动向的路径。数字技术在供应链和物流业中的使用优化了商品的生产和交付过程,大幅提升了商品配送效率,极大缓解了居民消费的流动性约束,充分激发了消费者的购买潜力^[35]。

第三,数字经济催生的平台经济和共享经济等新业态重塑了居民的消费理念,推动消费者形成新的消费行为和习惯,改变了原有的消费支出结构,消费决策更加理性,消费结构升级加速,绿色消费理念逐渐被大众接受,反过来也将促进产业结构向高级化、绿色低碳化转变。

3. 数字经济聚合区域市场

数据要素具有低成本、可复制、即时流通、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部分排他性)等区别于传统生产要素的特征^[36],决定了数字经济具有较强的规模效应、范围效应和网

络效应,天然具备聚合经济资源和经济主体以及提升生产要素流动性和协同性的动力。数据要素跨时空的信息传播,减少了不同区域要素市场和产品市场的信息摩擦。数字技术的使用,进一步提升了生产要素在不同市场间流通和合理配置的可能性。电子商务、平台经济和共享经济等数字经济新业态、新模式与新应用场景的出现,有效打破了区域市场间的地理壁垒,促进区域交易信息的互通互信,降低了区域间交易成本,进一步拓展交易市场边界,不断整合区域间市场^[37],优化区域分工,实现区域优势互补,使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建设成为可能。同时,数字经济的发展为政府治理带来新的思路,能够有效缓解政府失灵。数字技术在政府社会治理中的应用能够大幅提升政府信息获取能力,及时了解市场运行情况,减少政府决策时可能面临的信息不充分和不对称,加强各类主体的联动性,提升政府治理的统筹性和协同性,减少个别不当行政行为所带来的市场扭曲,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得以充分发挥,从而加快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建设步伐。

4. 数字经济助力创新驱动

互联网、大数据和云计算等数字技术一方面自身具有快速传递和更新的特征,另一方面为其他技术创新提供了更加强大的联通、计算和规划能力,降低了技术创新的成本,提升了创新的整体效率,因此数字技术创新成为当今经济创新发展的“主阵地”和关键引擎^[23]。微观层面,数字技术在企业内部

的应用使企业不断优化要素配置,对生产经营全过程进行更加精准检测和评估,帮助企业降低经营风险,更快获取市场需求信息和竞争信息,提升企业信息搜集效率,增强创新针对性,加快新技术推广及反馈速度,从而降低企业创新成本。中观层面,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的发展使经济主体间的技术和信息交流更加便利,一方面加剧了产业内部竞争,倒逼企业不断创新,另一方面为产业协同发展和政府、企业与研究机构跨界融合创新提供了便利,进一步提升创新效率。宏观层面,数字经济的共享性特征和数字技术的通用性特征使创新在各个环节逐渐融合,充分发挥技术创新的正外部性,带动全产业链的创新升级,逐渐形成集约化和指数化的经济增长路径^[38]。

(二)数字经济与国际大循环

1. 数字经济推动参与国际分工机制转变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利用比较优势,通过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参与国际分工,形成“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模式,实现了40多年的经济高速增长,但是在国际分工中部分产业面临“低端锁定”的困境。随着新技术革命的爆发,数据要素突破时空限制,在全球范围内广泛参与生产过程,凭借其不断增强的跨国流动性使不同国家或地区的要素流动和组合协作有了更多的路径选择,提升了经济体以优势要素参与全球分工的便利性和可能性,进一步推动了国际分工的发展和演变^[39]。另一方

面,数字经济发展通过改造生产过程,促进生产和研发环节的融合,提升技术复杂度,增加产品和服务附加值,使掌握更先进数字技术的国家能够以更低的成本和更高的效率参与国际分工,从而实现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提升。同时,由于数字经济明显的技能偏向性和网络效应,导致具有更充足劳动力、更完善数字基础设施和更大规模市场的国家,更有可能在新的国际分工中占据主导地位。因此,数字经济的发展,对具有超大规模国内市场的中国来说,具有重要的战略性意义。

2. 数字经济创新国际贸易模式

数字经济在贸易领域的不断拓展推动了跨境电商、跨境物流和数字贸易等国际贸易新业态、新模式和新组织的产生与发展。数字技术通过构建高水平的贸易信息沟通平台,不断提升国际贸易中信息联通程度,从而实现了国家间物流和资金流的互联互通,降低了国际贸易中的信息搜集成本,充分扩张订单渠道,缓解了国际贸易信息的不对称问题,促进了贸易链条中各环节的融合,使各经济主体间的联系更加紧密,提高了国际市场供需的匹配程度。数字技术对国际物流运输和仓储系统的优化,大幅降低了国际贸易过程中的运输成本。数字经济的发展促进了产业的融合发展,也使服务的可贸易性不断增加。个性化和多样化产品的需求,能够在国际市场中得到满足,从而不断拓展国际贸易产品和服务的品类。数字技术为国际贸易提供了更具效率和更加

安全的结算支付系统,加速了进出口程序的智能化升级,进一步降低了跨境贸易过程中的成本和风险。

3. 数字经济增强两个市场联动效应

从本质上来说,国际市场是国内市场的延伸。数字经济对国际贸易途径的进一步畅通扩大了市场体量,使企业能够在更大范围内实现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国际数字平台建设加深了本土企业与国际市场的互联互通程度,使国内企业能够更加便利地获取国际市场信息,充分利用国际市场的先进生产要素,迅速接触国际市场中新的技术和产品,推动企业深度嵌入全球供应链,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同时,国际数字平台的搭建,将以更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国内生产方式的不断改进和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充分释放国内市场要素活力,在实现全球价值链水平攀升的同时,提升国内产业链供应链韧性,保证国内市场各环节之间的衔接与畅通,进一步提升国内经济循环水平。

数字经济的全球化发展在整合全球要素资源和调节全球供需的同时,也将提供新的区域组织的协商机制,进一步促进国内规则制度与国际贸易规则制度的接轨。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提升国际贸易的规范化程度,破除制度壁垒,搭建更加国际化、法治化和便利化的营商环境。同时,数字经济的发展有助于吸引更多高质量外资,打造国际前沿产业集群,以制度型开放帮助国内大循环“补短板”。依托更加强大的国内市场不断提升国际竞争力,进一步参与到全球数

字经济治理和贸易规则制定过程中,在国际经济市场掌握更多主动权。

四、数字经济促进新发展格局构建的实现路径

蓬勃发展的数字经济以前所未有的广度、深度和速度深刻影响着经济活动和社会生活。立足中国经济发展新阶段,必须关注数字经济发展,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的战略机遇,以数字经济发展推动新旧增长动能转换,通过夯实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培育数据要素市场、推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建立自主创新体制机制、加强国际信息平台建设,畅通国内国际经济活动各个环节,发挥数字经济对新发展格局构建的积极作用。

(一) 夯实数字基础设施建设

数字基础设施是数据传输的基础和载体,为数字经济的发展提供底层支撑。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完善程度直接决定了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的发展水平,在国民经济循环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当前,中国数字基建仍处于起步阶段,规模相对较小,网络效应和集群效应难以充分发挥;区域和城乡间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水平仍存在较大差异。数字经济发展不平衡现象较为突出,不利于区域协调发展和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建设^[40]。因此,必须进一步加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进一步扩大数字基建规模,优化数字基建布局,为数据要素的生产、流通和使用提供

安全、高效和便捷的渠道。重点加强西部地区和农村地区的建设,充分发挥数字经济的普惠机制,避免“数字鸿沟”问题。重视数字新基建与传统基建之间的衔接和互补,加快传统基础设施的数字化改造,充分发挥数字经济在协调区域发展和畅通经济循环中的重要作用。

（二）培育数据要素市场，完善数字经济配套制度规则体系

作为新经济形态,数字经济发展的配套政策和监管体系尚不完善。数据要素市场仍未得到全面的培育和发展,数据管理制度也存在许多漏洞。数据安全仍存在威胁,平台垄断现象时有发生,危及了数字经济市场的公平竞争,也阻碍了技术创新。因此,必须尽快完善数据要素交易规则,加快数据质量标准制定和定价机制的确立,建立流通有序和利用高效的数据要素交易市场和使用平台,推动数据信息开放共享。同时,政府部门应着力提升数字治理能力,完善数字经济相关服务体系,强化数据安全保障职能。建立健全数据产权保护制度,破除数字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制度障碍,进一步探索数字经济监管政策措施。建立专门数据交易监管职能部门,推动平台自治与政府监管联动,合理协调利益冲突,维护数字经济市场秩序。及时应对数字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和新矛盾,优化数据要素与其他生产要素的整合利用方式,促进数字技术的不断发展和成果的广泛应用,充分释放数据要素和数字技术的生产潜力,提升经济整体生产效率和供给

质量。

（三）强化基础研究，建立自主创新机制

在数字经济时代,创新已然成为经济发展的第一驱动力。数字经济发展和数字技术的应用,降低了企业创新成本,提升了创新效率,激发了社会的创新潜力,促进了经济发展动能的转变。但在数字经济发展过程中,中国部分关键核心技术仍受限于人,存在个别技术创新短板,阻碍了经济循环的畅通。为了提升中国创新活力,进一步挖掘创新潜力,必须推动科技体制与创新体系建设。在国家层面,要发挥举国体制,深刻洞察全球创新动向;紧跟技术前沿,引领重大原创性科技成果攻关;加大在科技研发尤其是基础研究中的投入和支撑力度,充分调动各类创新要素的聚集与协同。在科研机构 and 高校体系中,完善科技人才培养体系,加大科技创新激励力度,充分调动科研人员创新积极性。在市场层面,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以功能性的产业政策为引导,充分激发企业在技术开发和应用中的创新活力。在社会制度层面,进一步完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加强各创新系统之间的协同合作和有序衔接,进一步缩短创新应用和反馈周期,在全社会形成崇尚创新的良好氛围。

（四）推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发展

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融合发展就是将数据要素和数字技术渗透进实体经济活动运

行的全过程,实现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的协同发展。在生产端,一是引导实体企业和互联网企业开展深度合作,鼓励实体企业利用数字技术更新研发设计,开展创新业务,改造管理系统,实现实体企业提质增效。二是加快工业互联网规模化应用,着力推进智慧农业和生产性服务业发展,以数字赋能产业转型升级,实现全球价值链地位攀升。三是着力培育人工智能、大数据和云计算等数字核心产业,发挥数字龙头企业整体优势,培育数字产业园区和产业集群,充分发挥数字产业规模经济、范围经济和网络效应。在需求端,鼓励数字经济新产品、新模式与新业态的产生和发展;利用超大市场规模和丰富应用场景优势,建立数字消费平台,从而改造消费模式,进一步拓展市场边界;扩大市场体量,充分发挥网络效应、规模效应和长尾效应;深入挖掘新的投资和消费需求,激发消费潜力。

(五) 加快数字产业“走出去”,积极参与数字经济全球治理

数字经济的国际贸易与国际合作,为中国数字经济提供了更广阔的发展空间。这不仅有利于中国参与国际数字技术创新合作,及时了解数字经济发展的国际趋势,而且能够帮助中国产业实现全球价值链的攀升,是当前中国参与国际大循环的重要内容。为进一步提升中国数字经济参与国际经贸活动的质量,首先要依托“数字丝绸之路”,深化“一带一路”数字贸易制度建设,推动经贸合作数字化发展及其与国内数字经济产业的有效

联动,加快国际数字贸易布局,引导数字经济龙头企业“走出去”,抢占全球数字贸易发展的先机。其次,要积极推动数字技术创新的国际合作,探索区域内数字基础设施联通机制,打造国际化数字经济合作共享平台,促进数字技术前沿领域的协同创新。最后,积极参与数字贸易规则制定和数字经济全球治理机制的建立,保证中国在全球数字贸易和数字治理领域的话语权,突破数字贸易壁垒,分享全球数字贸易红利,从而进一步畅通国际大循环。

五、结语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是党中央立足当前国内外形势做出的重大战略部署,是中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的主要抓手和重要内容。本文深入分析数字经济特征及当前构建新发展格局的现实困境,厘清数字经济助推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内在逻辑,探寻中国未来通过发展数字经济畅通经济循环活动,扩大市场规模,提升经济运行质量,从而推动新发展格局构建、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可能路径,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但本文的研究主要是从理论和概念层面进行定性分析,对该问题的研究需要更多的实证研究和具体案例的支持,后续研究需要结合宏微观数据和经济实践中的具体情况对该问题进行进一步探讨,不断加深对数字经济赋能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认识,优化相关政策措施,完善和丰富相关研究内容。

参考文献:

- [1] 蒲清平,杨聪林. 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现实逻辑、实施路径与时代价值[J]. 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6):24-34.
- [2] 裴长洪,刘洪愧. 构建新发展格局科学内涵研究[J]. 中国工业经济,2021(6):5-22.
- [3] 沈坤荣,赵倩. 以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推动“十四五”时期经济高质量发展[J]. 经济纵横,2020(10):18-25.
- [4] 董志勇,李成明. 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历史溯源、逻辑阐释与政策导向[J].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20(5):47-55.
- [5] 黄群慧. 新发展格局的理论逻辑、战略内涵与政策体系——基于经济现代化的视角[J]. 经济研究,2021(4):4-23.
- [6] 洪银兴,杨玉珍. 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路径研究[J]. 经济学家,2021(3):5-14.
- [7] 江小涓,孟丽君. 内循环为主、外循环赋能与更高水平双循环——国际经验与中国实践[J]. 管理世界,2021(1):1-19.
- [8] 彭红枫,梁子敏.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金融支持研究[J]. 经济与管理评论,2021(5):5-20.
- [9] 李晓华. 数字经济新特征与数字经济新动能的形成机制[J]. 改革,2019(11):40-51.
- [10] 谢康,夏正豪,肖静华. 大数据成为现实生产要素的企业实现机制:产品创新视角[J]. 中国工业经济,2020(5):42-60.
- [11] 任保平,李婧瑜. 数据成为新生产要素的政治经济学阐释[J]. 当代经济研究,2023(11):5-17.
- [12] 王开科,吴国兵,章贵军. 数字经济发展改善了生产效率吗[J]. 经济学家,2020(10):24-34.
- [13] 戚聿东,褚席. 数字经济发展、经济结构转型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J]. 财经研究,2021(7):18-32,168.
- [14] 马述忠,郭继文. 数字经济时代的全球经济治理:影响解构、特征刻画与取向选择[J]. 改革,2020(11):69-83.
- [15] 马飒,黄建锋. 数字技术冲击下的全球经济治理与中国的战略选择[J]. 经济学家,2022(5):48-57.
- [16] 罗茜,王军,朱杰. 数字经济发展对实体经济的影响研究[J]. 当代经济管理,2022(7):72-80.
- [17] 余东华,李云汉. 数字经济时代的产业组织创新——以数字技术驱动的产业链群生态体系为例[J]. 改革,2021(7):24-43.
- [18] 史丹. 数字经济条件下产业发展趋势的演变[J]. 中国工业经济,2022(11):26-42.
- [19] 夏杰长,刘诚. 数字经济赋能共同富裕:作用路径与政策设计[J]. 经济与管理研究,2021(9):3-13.
- [20] 曹正勇. 数字经济背景下促进我国工业高质量发展的新制造模式研究[J]. 理论探讨,2018(2):99-104.
- [21] 荆文君,孙宝文. 数字经济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一个理论分析框架[J]. 经济学家,2019(2):66-73.
- [22] 赵涛,张智,梁上坤. 数字经济、创业活跃度与高质量发展——来自中国城市的经验证据[J]. 管理世界,2020(10):65-76.
- [23] 李震. 数字经济赋能新发展格局:理论基础、挑战和应对[J]. 社会科学,2022(3):43-53.
- [24] 李天宇,王晓娟. 数字经济赋能中国“双循环”战略:内在逻辑与实现路径[J]. 经济学家,2021(5):102-109.

- [25] 胡莹,刘铿.数字经济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的理论机制研究——基于马克思资本流通理论的视角[J].当代经济研究,2023(11):18-27.
- [26] 王亚菲,洪聪恺,刘昊,等.经济双循环质量评价及数字经济的赋能效应研究[J].统计与信息论坛,2023(7):3-17.
- [27] 黄群慧.“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深刻内涵、时代背景与形成建议[J].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1):9-16.
- [28] 蔡昉.构建新发展格局的着眼点和着力点[J].财贸经济,2022(12):5-8.
- [29] 谈东华,戴翔.贸易数字化:双循环有效联动的新引擎[J].国际贸易,2022(1):18-25.
- [30] 蔡继明,刘媛,高宏,等.数据要素参与价值创造的途径——基于广义价值论的一般均衡分析[J].管理世界,2022(7):108-121.
- [31] 罗玉辉,赵玉峰.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的理论阐述与政策方略——基于政治经济学的分析[J].当代经济管理,2023(9):13-20.
- [32] 黄姝菡,张奎,谭永生.新发展格局下构建高质量收入分配体系的路径研究[J].经济问题探索,2022(2):58-66.
- [33] 李军林,许艺煊.中国居民收入分配格局的演变与原因——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考察[J].南开经济研究,2021(1):36-57.
- [34] 程恩富,张峰.“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政治经济学分析[J].求索,2021(1):108-115.
- [35] 马香品.数字经济时代的居民消费变革:趋势、特征、机理与模式[J].财经科学,2020(1):120-132.
- [36] 蔡跃洲,马文君.数据要素对高质量发展影响与数据流动制约[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21(3):64-83.
- [37] 陈伟光,裴丹,钟列炀.数字经济助推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理论逻辑、治理难题与应对策略[J].改革,2022(12):44-56.
- [38] 陶金元,王晓芳.数字经济驱动创新发展的挑战与对策[J].宏观经济管理,2021(6):18-25.
- [39] 张二震,戴翔.数字经济、要素分工与中国高水平对外开放[J].思想理论战线,2022(1):118-127,139.
- [40] 郭朝先,王嘉琪,刘浩荣.“新基建”赋能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路径研究[J].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6):13-21.

(责任编辑:杨南熙)